

告 讀 者

亲爱的讀者：

今天，我們生活在新中国是多么幸福啊！这儿沒有剝削、沒有压迫，人們都在不同的崗位上，为偉大的社会主义建設事业辛勤地劳动着。

可是，你們有沒有想到过：解放前的旧中国是个什么样子呢？那时候，广大的工人、农民是怎样过着悽慘的生活呢？这些，对于生长在新中国的广大青年來說，都是比較陌生的；即使在旧社会生活过的人，有的也許漸漸淡忘了吧！

俗話說：知道黃連苦，更知蜜儿甜。只有認清了資本主义制度的丑惡，才能更加了解社会主义制度的美好；对旧社会有着刻骨的仇恨，才能对新社会有无比的热爱。为了帮助大家了解旧社会的黑暗，更加热爱新社会，我們打算編輯出版一套工农家史小丛书，作为自我教育的材料。如有不妥的地方，希望同志們提出意見，以便改进。

編 者

1963年10月

幸福的晚年

安庆电厂退休老工人 郑本裕

不提旧社会还好，提起旧社会，真是苦水淹心啊！说什么我也不能忘记那个万恶的旧社会带给我的苦难。

父母双亡

我老家是怀宁县高河埠，祖祖辈辈都是忠厚老实的贫苦农民。父亲郑明月在地主家打长工，他当牛当马，一年累到头，受尽了压迫和剥削。

前清光绪二十七年破了圩，庄稼被淹没，乡下没法生活，父亲才带领我们全家来到安庆。那时我只有四岁。依靠父亲当厨子，妈妈和哥哥拣柴、卖花生来维持生活。

我十岁那年，不幸父亲生了伤寒病。穷苦人哪来钱医治，不久他就死去了。丢下妈妈和我们兄妹五个，从此我们的日子更艰难了。妈妈又愁又急，日夜啼哭。谁知祸不单行，后来妈妈也害了病，遍身浮肿，

挨过了两年，疾病也终于夺走了妈妈的生命。可怜我们五个孤儿，最大的哥哥十七岁，最小的妹妹才三岁。妹妹送给人家做了童养媳，我们兄弟三个跟着叔叔过活。叔叔挑水、做小工，家境很艰难，我们只好又离开他家各自谋生。

起初，我在安徽造币厂做了几年临时工。到一九二五年，我开始到安庆电厂做工。从这以后，我前前后后在安庆电厂蹲了三十五年。

旧社会的工厂——人間地獄

說到在旧社会做工，苦处实在說不完。

在安庆电厂里，起初我是个临时工，专门帮助外线工挖洞竖电线杆子。不久又改在锅炉房里挑煤。說是挑煤，实际上象摇車、生火、出煤渣等什么活儿都干。那时候，工人每天一般都要劳动十二三个鐘头，我是临时工，劳动的时间更长，每天都要劳动十五六个鐘头。一天干下来，真累得死去活来。

后来，我被调到锅炉房里生火。生火这项活儿可不简单，锅炉房里那么热，又没有通风设备，上煤时，身前有通紅的火炉，背后有滾燙的气磅，人站在中間，烤得渾身发痛。冬天，穿件破棉袄，都汗流浹背，夏天更不用說了。

当然，最苦的活儿还是出煤渣子。

过去，我們电厂在安庆大南門招商局的一間破仓库里，厂房不大，那間渣子房更矮小，只在靠长江的那面墙上开一个小窗口，平时人呆在里面，都感到很闷气。

渣子房沒有一点通风設備。夏天出渣子，簡直象爬“火焰山”，那熊熊的煤渣，象山倒了一样从火炉里傾泄出来，火头窜有尺把高，人站在旁边能把身上肉烤焦。資本家只顧賺錢，哪管我們死活，連个口罩、手套都不給买。

把煤渣从炉膛里扒出来以后，来不及等它完全冷却，就忙着一担一担地挑出去。什么时候挑完，才能休息，白天挑不完，夜里也得挑。如果稍一耽擱，就要影响到下一班的作业。

为了使煤渣快点冷却，我們只好在剛出炉的煤渣上潑些冷水，可是，火紅的煤渣經過冷水这一潑，顿时热气象一团濃霧，充滿了整个渣子房，对面看不见人，不仅薰得人火辣辣的难受，炉灰还呛得气都喘不过亲。实在憋不住了，就爬在墙上那个小窗口上，把头伸在外面換口气。

因为沒有口罩帶，每次出煤渣时，两个鼻孔都被灰渣塞住了，只好往肚里嚥，一咳嗽，痰都是黑的，

一連几天变不过来。这样长年累月地干，哪有个不生病的，不是得了鼻炎，就是害了肺病。解放前，渣子房里有个老工友楊善荣，就是因为多年出煤渣，终于害了严重的鼻炎和肺病，又没有钱医治，结果就病死了。

安庆电厂是一九〇七年由舒鸿胎、何树搖、馬伯璠等七个资本家和豪绅合资创办的，一九二九年改为官商合办，到一九三七年才全部由国民党政府接收。厂长起初是李仲明，后来是刘祖輝（是国民党員）。前后几十年里，虽然人事几经变迁，可是，这些官僚、资本家们对待我们工人的恶劣态度，却始终没有变化。那时，我们工人在政治上没有一点地位，更谈不到有什么自由。不用说，我们工人是根本没有资格同厂长说一句话的。按照厂里的“规矩”，我们看见厂长，一定要鞠躬。不仅如此，国民党、资本家为了“管束”我们，借口说防止工人偷窃，在厂房周围架起电网。我们每天上下班，都走旁边一个小便门，狗腿子就坐在门旁监视着。这哪里是什么工厂，它活象个人间地狱！

谈起工人的生活更是和牛马一样。除了受国民党、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以外，还要受封建把头的欺侮。我的工资是四角钱一天，可是经过封建把头的敲诈勒索，到我手上只有三角多了。特别是我结了婚，生了

好几个孩子，吃饭的多了，这点工资怎么够维持生活呢？只好饱一餐、饿一顿。有时，我老婆和孩子们挖点野菜，买点粉糠，再向人家要点山芋渣来糊口。至于我们身上穿的，都是补丁连补丁，象一羣叫化子。

記得一九三三年的夏季，有一天，我們工人因为家里穷得沒柴燒，在厂里拣了一点二煤（燒过的廢煤）。这事被狗腿子方积五知道了，他不管三七二十一，硬賴我們偷了厂里的煤，并且勾結国民党反动政府，把我和張玉桂、何启明、何明海、胡荣善等五人抓到伪警备司令部。

我們被抓到那里以后，滿臉凶惡的警备司令徐云鵬，立刻审問我們。狗嘴里吐不出象牙。他大声向我們喝問着：

“你們为什么要扰乱治安，破坏市面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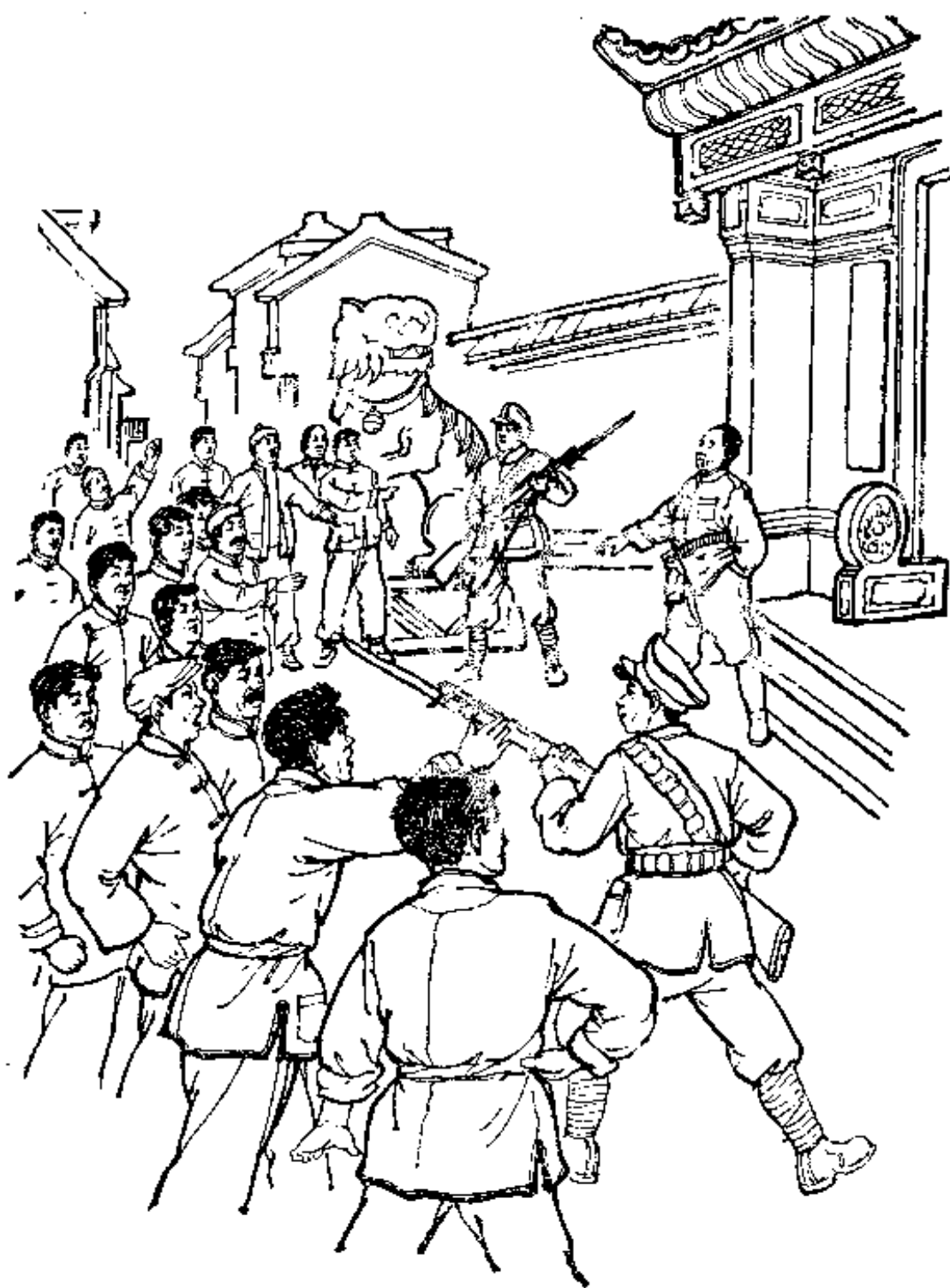
我們五人也都理直气壮地一齐反問道：

“我們工人沒錢买柴燒，拣了一点二煤，难道就犯了法？”

这一下，可把徐云鵬恼了，他气得象个吹猪的，大叫：

“我看你們都是‘赤化分子’！”

他一面命令几个士兵，用木棍把我們五人打了一頓，接着又掏出一張名片遞給士兵，把我們押送到伪



怀宁县政府的牢房里关了起来。

我們被捕的消息，很快被厂里工友們知道了。他們气不过，一齐跑到伪警备司令部向徐云鹏要人，并且表示：如果不釋放我們，当天晚上就停止发电！这一来，把徐云鹏吓倒了，才不得不把我和何启明、何明海三人放了出来。就这样，我們整整餓了一天。張玉桂和胡荣善两人，却一直被关了一个多月。他們出獄以后，又被資本家开除了。

在日本人的鉄蹄下

抗日战争爆发以后，国民党军队不战而逃。到一九三八年旧历五月，日本鬼子快要逼进安庆了。厂长刘祖輝，丢下我們工人不管，把厂里的現金和貴重物品席卷一空，准备帶着老婆逃跑。这个消息傳出来以后，工友們没有一个不罵他的。为了向他討几个工錢活命，我和几个工友飯也沒吃，一口气追到北門二里半。可恶的刘祖輝不但不給錢，还把我們大罵一頓，那个封建把头也狗仗人勢，伸手要打我們，我們只好忍气吞声地回来。

那几天，日本鬼子的飞机声、大炮声响个不停。安庆城的大街小巷，到处挤滿了逃难的人，你喊我叫，乱哄哄的。这时，电厂已經停頓，工友們都四处逃

散。我也就帶領老婆孩子連夜逃到乡下躲難。

在乡下，我們人地生疏，舉目無親，日子困難到了極點。我和老婆每天挖野菜吃。

就在這時，我老婆生下了第三個兒子。有錢人家做月子吃鷄魚肉蛋，可憐我們窮人連稀飯都吃不上，只能以菜度命。我老婆生產后才三天，就下地挖野菜了，因為產後沒有營養，從此得了一身毛病。而我的第三個兒子落地只七天，因為沒有奶喝，也就活活地餓死了。

一九三九年秋天，我們在乡下實在活不下去，只好又回到安慶。我在日本鬼子經營的一家冰凍廠做苦工。累死累活，一天才掙兩角錢（日本票），只能買一升多米。家里人口多，不夠吃的，就買些日本鬼子吃不了倒在槽水缸里的剩飯吃。這種飯實在難下嚥，里面什麼都有，又酸又臭。我們大人還能忍耐住，孩子們一捧起飯碗可就哭開了。能怪孩子嗎？這的確是有錢人家的豬狗都不吃的啊！

這時候，我的大兒子立才已經十四五歲了，他是一個很懂事的可愛的孩子。他看到家境這般艱難，一天，他不聲不響地拿了一個鐵畚箕和一把掃帚，偷偷地跑到輪船碼頭上掃地下搬運撒下的碎米去了。碰得巧，一天能掃碗把米，要是倒霉被日本鬼子看見了，

不但把扫来的米拿走，还要挨一顿毒打。可怜小立才不知被打过多少次。

我在冰冻厂干了一年多，后来又重新回到电厂。我的大儿子也进了电厂，在锅炉房里跟我学生火。

想起日本鬼子占领那几年，真不是人过的日子。

在日本鬼子的眼里，我们中国人都是“亡国奴”，打死一个中国人，等于掐死一个蚂蚁！他们烧杀抢掠，强姦妇女，什么灭绝人性的事都干得出来。

我们电厂靠近长江，煤渣就倒在江边。一天，有一个小女孩在江边拣煤渣，被一个日本鬼子看见了，他弯腰拾起一块石头向那个小女孩砸去，说来凑巧，偏偏砸着小女孩的头，血流不止，当时小女孩就哭倒在地。她的妈妈闻声赶来，哪儿敢吭一声，只好眼泪汪汪地把女儿背回家去。因为流血过多，听说没几天，那个小女孩就死去了。象这样的事真是太多了。

我们在电厂里做工，命运也好不了多少。每天上下班，看见日本鬼子，都要脱帽鞠躬。不然的话，轻的罚站，重的挨打。有一回，我上班忘记向日本鬼子鞠躬，他顺手捞到一把火钩子，没头没脑地痛打我一顿。

在厂里，特别有一个名叫斋藤的日本鬼子，最是万恶滔天。他矮矮的个子，一脸横肉，向天翘着的鼻子下面，留着一小撮东洋胡子，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刽

子手，全厂几十个工友，差不多没有一个不被他打过。

那时候，我們干活一天累到晚，得不到休息，值夜班难免要打瞌睡，可是，如果被斋藤看见了，就一定遭他毒打。有个工友楊吉和，因为好瞌睡，曾被斋藤打过无数次。这个斋藤还經常踮着脚尖走路，贼头贼脑地来到鍋炉房監視我們。所以工友們都叫他“大扒手”。

后来我們比較警惕了，在打瞌睡前，先派人在門口路旁放哨。可是誰也沒想到，有一回，斋藤故意不从大路来，他偷偷摸摸地从江边涵洞里爬了进来，剛好我正在打瞌睡，被他看见了，他哇哇地怪叫，把我痛打一頓。出渣工方在玉，有一次也是因为打瞌睡，被斋藤一脚踢倒在滾燙的煤渣上，斋藤騎在他的背上，两手掐住他的脖子，把他的头和胸部在煤渣上来回地揉，一直燙得他的身子发焦，方在玉痛得大叫。

最令人气愤的是，有时候，日本鬼子为了污辱我們中国人，他們自己不动手打，却要我們两个工友互相打臉，打輕了不算，一直把两人的臉打肿得象个桃子，才讓住手。而他們却在一旁狞笑。

日本鬼子只知道叫我們卖命，絲毫不重視我們的安全生产。有一回，我剛要下班，突然鍋炉坏了，日本鬼子不等炉膛里冷却，硬逼着我鑽进去修理。这

时，炉子刚熄火不久，热气还没有消除，里边温度很高，明知进去有生命危险，但是身旁站着凶恶的日本鬼子，有什么办法？我只好找来一块木板垫着身子，爬进炉膛里去。谁知当我打开炉门刚爬进炉膛里时，立刻，里面象个热蒸笼一般，炙得透不过气，我头脑昏昏的，浑身汗珠直冒，穿的衣服湿得象水洗的一般，当汗珠滴在滚烫的钢管子上，都吱吱地响。就这样，我一直待在炉膛里干了一个多小时，才把炉子修好。等我从炉膛里爬出来时，就一头栽倒在地，昏过去了。

希望变成了泡影

一九四五年八月，日本鬼子无条件投降了。我满心欢喜，认为这下该有出头之日了，没想到希望又成了泡影。走了日本鬼，来了国民党，抗战胜利带给我们的，仍旧是无穷的灾难。

胜利不久，刘祖辉又回到厂里当厂长，他的狗腿子也照旧骑在我们头上，剥削和压迫着我们。他们动不动说他们是从什么“大后方”来的，是抗战的“功臣”，而把我们在“沦陷区”里真正同日本鬼子进行着你死我活的搏斗的人们，看成简直好象仍是“亡国奴”！

一天，刘祖辉来到厂里，这个表面上斯斯文文内

心里却阴险毒辣的家伙，一眼看见了我，他皮笑肉不笑地说道：

“郑本裕，你还在这里啊！”

“是的，老爷。”我只好硬着头皮回答。

“那你还记得八年前二里半的事吗？”

我一听，心想糟了。果然，以后他就处处找我的岔子。那个狗腿子也乘机想捞一把，逼着我给他送礼。胳膊扭不过大腿。没法子，我只好向别人借了几十块钱，在吴樾街颐和园饭馆里，请这个狗腿子吃一顿，才算把饭碗保住。就这样，以后逢年过节，不管我手里多么困难，也要想办法给他送点彩礼。

那时候，我们工人的工资很低。工资最多的，每月只有二十元，能买两担米。工资最低的，每月十二元，只能买担把米。可是厂长、资本家呢？他们不劳动，每月却拿到三百多元，超过我们工人几十倍。厂长刘祖辉，他家除了有男女两个佣人以外，还有一个黄包车夫。

在国民党时代，物价飞涨，早上领到钱，还能买担把米，到了下午，就只能买几斗了。而厂里三个月才能“调整”一次工资，有时工资刚领下，转眼就成了废纸，真使人哭笑不得！

最奇怪的是，在一九四八年，国民党政府由于滥

发鈔票，币值貶低，印刷好的新鈔票还没有出籠，就变成了廢紙。有一次，他們实在沒法处理了，竟把整箱整箱的嶄新的鈔票，运到电厂燒炉子发电，一直燒了十多天才燒完。

可是另一方面，我們工人仍旧苦得要命。冬天值夜班，又冷又餓，真不是滋味。为了取点暖，工友們都跑到鍋炉房里睡地鋪，大家叫它“叫化子攤”。我家最穷，全家八口人，只有一条破棉被。值夜班沒有被子盖，我只好爬到一丈多高的鍋炉頂上，睡在烟道上面，身上盖一条破草包。可是这样也不好受，背貼着烟道，燙得难过，身上却又冷冰冰的，冻得要命，而且一觉醒来，遍身都是烟灰，連鼻孔都是黑的。

由于生活的折磨，一次，我病了。我向封建把头要点药吃，他不但不給，还罵我：“死掉活該！”后来，身子实在撑不住，向他請几天假，他不准假，还說什么：“你要干就干，不干就滾！”端着人家的碗，就要受人家管。在那个吃人的旧社会里，象我們这般穷苦的人，叫天天不应啊！

欢乐的晚年

自从来了共产党，吹散烏云見太阳。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三日，安庆解放了。从此我才彻底翻了身。

我心里真有說不的快乐。

在党的教育下，經過历次政治运动，我的阶级觉悟有了提高。一九五五年，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
由于南門外厂房十分破旧，早在一九五二年秋天，領导上就选定安庆东郊炮营山作为厂址，另建新厂。經過一年的建設，就已开始送电，而且規模比解放前大大地扩充了。現在，我們电厂的設備容量，已比解放前增加了三倍。一天的发电量，就等于解放前一个月发电量的总和。每天上下班，当我们看到那一排排漂亮的厂房和那高入云霄的烟囱时，我从心眼里感到高兴。

解放前，我們的职业沒有保障，天天担心被资本家开除。解放后，我們电厂很快实行了劳保，不但职业有了保障，而且工伤事故还能得到免費治疗。我因身体不好，一九五三年还去北戴河疗养过。

現在，我們劳动条件比过去好多了。鍋炉房里有通风設備。夏天有冰棒吃，有蒸豆湯喝。值夜班有床鋪，公家还给被子盖。由于改进了操作方法，出煤渣再也不用人挑了。

解放后，工人不仅在工作条件和物質生活等方面得到大大的改善，在政治上也享受很高的荣誉。一九五五年，我和大家在一起，研究改进了操作方法，創

造了“长火床，薄煤层，低风压”的先进锅炉燃烧方法，大大減低了煤耗，因此我被評为全国电业系統先进工作者。一九五六年，我去北京出席了全国电业系統先进工作者代表會議。特別使我終身难忘的是，在大会上，我看到了我們的救命恩人，偉大的領袖毛主席，毛主席还和我們在一起照了相。

我正想在我一生最后的几年中，努力生产，来报答党和毛主席的恩情，可是，旧社会几十年的苦难生活，摧殘了我的身体，我害着严重的高血压和肺病，特别是近几年越来越严重了。領導上多次动員我，我不得不从一九六〇年开始退休了。退休以后，組織上每月还給我五十六元生活費。

現在我家有十一口人。三个儿子都做工，四儿子也讀到初中了。大儿子和三儿子都已經結过婚。另外还有四个孙男孙女，大的也已經讀中學了。

我今年六十七岁。我一生經歷过清朝、民国、北洋軍閥、日本鬼子和国民党等好几个朝代。但是在旧社会里，不論哪个朝代，都沒有我們工人过的日子，只有在共产党和毛主席时代，我們工人階級才真正翻了身，做了国家的主人。吃水不忘挖井人。我要教育儿孙們，永远地听毛主席的話，跟共产党走！

(士萼整理)

旧社会的四十八年

安庆市搬运老工人 沈贤友

我今年六十二岁了。在旧社会里四十八年，是从尖刀山上走过来的。历尽重重磨难，受过种种欺凌，被生活赶到东逼到西，都在旧社会的黑锅底打转，哪能摆脱被压迫被剥削的命运。

破 产 逃 亡

我的老家住在怀宁县的李家嘴。祖祖辈辈都穷，爹爹只丢下了一亩多田的产业。因为养不活家小，父亲只得把田交给叔叔代兴，自己到安庆城里给一个姓陈的资本家看门。我十三岁上死了母亲，在家无依无靠，父亲含着眼泪把我送到本村地主魏得和家放牛。吃的是猪狗饭，睡的是牛房，每天麻麻亮就起身扫牛栏、拣粪，从早到晚除了服侍牛，还得给他家挑水、扫地、刷马桶。稍不如意，便要挨打受骂。一次，牛粪没有拣净，地主便拳打脚踢。雨天雪天，都要我赤着脚背他的儿子上学下学。

一九一九年，我十八岁了。父亲借债盖了三间茅屋，给我娶了亲，回家种田。可是因为田地少，亏空多，稻子收上场，还人都不够，家里瓜菜当饭，还是混不下去；加上后来父亲年老被解僱了，一九二三年，我又只好回到地主魏得和家当长工。在魏家帮工时的苦处是说不尽的。别家帮工到腊月二十四满工，魏家到了腊月三十日，还硬要我把他家的粪缸掏光，地扫干净，厨房里的柴和水都挑足，最后才肯放我回家过年。

真是穷人多难。一九二七年秋天，父亲因为穷苦受累又没钱医治，一病死了。家里实在毫无办法，好歹靠亲戚家凑了几斗米，请了几个抬脚，把祖传的一亩多田押给人家买了口薄棺材，才勉强把父亲埋葬下去。

父亲死后，我赤手空拳，仍只好在魏家帮工。一九二九年冬天，债主坐在我家逼债，口口声声说：不把账还清，就要把我父亲的尸骨从棺材倒出去。我被逼得没有办法，便硬着头皮去找魏家，想求他预支几个工钱。谁知我刚一开口，魏得和不但一个钱不借，反冷笑着说：“哪里有活没干就先支工钱的！”一听他这些话，我肚子都气炸了。心里想，帮他家做了十多年的牛马，他却这样的心黑！自己把心一横，便下

决心死也不再在他家帮工。回到家里，把原来贖回来的一亩多产业，干脆抵了債。

一九三〇年春天，我便挑着一担籬筐，一头装着孩子，一头装着一床破絮和几只飯碗，跟妻子一起，离开了祖祖輩輩居住的李家嘴，决心到安庆城里找个活命的地方去。

到处沒有活命的地方

进城前，我原以为到了城里总可以凭力气吃飯，不会再挨餓受罪了；誰知道城里同样是富人的天下，同样沒有我們这班穷人喝的水。一到安庆，我瓦无一片，地无一分，人生地不熟，連个落脚的地方都沒有，真是走投无路。后来好歹租上了資本家王荣和的一間破烂的毗屋，每月除了一吊鈔的房租，我妻子孩子还得白給他家挑水、扫地和干杂活。有了个落脚地点，我白天黑夜扛着扁担繩子滿街轉，只想找个活干，可是那比什么都难。有时一天挑个角把錢，只能买几个燒餅，喝点开水充飢。晴天还好些，遇上雨雪天找不到活干，便只好坐在家里，眼睜睜看着一家人餓肚子。

进城后第二年正月初，一天，我正在馬路上找活干，迎面来了几个国民党保安队，他們象瘋狗一样一

拥而上，将我五花大绑，和其他被抓的人用一条麻绳连着，带到五里庙关在一间破屋里，又冻又饿，饭没得吃，水也没得喝。那时我妻子刚生第二个儿子才七天，知道我被抓差后，两眼哭肿得像灯笼一样，自己省着不吃，每天跑五里多路给我送吃的。七天后，我被解走时，妻子把一件破棉袄当了两块钱，当她准备送给我做路费时，保安队见了，一枪把子把她推倒在地。我当时真恨不得拿命跟他们拚了。

我在桐城、舒城一带，一连挑了三个多月伙。挑行李、揸子弹，肩挑肿了，脚也磨破了。一天傍晚，有个伙伙叫我去塘边洗菜，我真恨死他们，就揪个篓子跑了。我一天一夜跑了一百几十里，身上没有一文钱，肚子饿得咕咕地响。天黑时，我到家一看，老婆、孩子正哭成一堆呢。

那一年，广济圩破圩，城里也闹荒，我老婆和两个孩子只好天天到难民所去，讨碗饭粥喝。讨不到时，便去捡人家丢下的菜边剩叶填肚子。孩子瘦得皮包骨头，张口要吃，饿得日夜直哭。

地主的心是狠的，资本家的心也是狠的。王荣和明知道我家饿肚子，还逼我要房租。天天到我家大吵大骂，要赶我们出门，骂着说：“再不交钱便把屋上的瓦揭掉！”苦撑苦熬了一年多，宁肯家里稀稀水水地

吃不飽，还是攢积了几个錢把房租还清了，另在大南門租了一間棚屋。

一九三五年，在大南門頂替了別人的名字，到碼頭上挑“馱脚”。尽管一天只落得十几个鈔，凭着那时年輕力壯，別人不干的活我干，別人只挑一百二十斤，我挑一百七十斤，別人推車跑一趟，我肩挑背扛就多跑几趟。这样苦干了两年，家里生活才勉强維持下来。可是正在这时候，日本鬼子却打来了。国民党丢下老百姓不管逃掉，資本家也卷起金銀財宝溜走了。飞机成天扔炸彈，碼頭上躉船被拖走。我无活可干，一家人又陷进了絕境，便只好拖儿带女到乡下去避難。

下乡后，住在怀宁县大安嘴三叔的岳父家。他家是富农。我給他家种田，大儿子放牛。說定秋收时打下粮食三成分給我家一成。誰知做了一年，稻子一上場，他却全收进了自家仓里，只給我家几斗杂粮。加上我們是穷亲戚，平时也尽受气。妻子受气不过，便說：“在这里忙死也是白給他家忙，不如索性回城里去。”一九四〇年初，一家人又进了城。

給日寇当牛馬

回到城里时，一家人見了日本兵那副凶恶相，全身就吓得发抖。进城的第一天，一家大小夜晚連个住

处都没有。大南門原来洪家的房子已经被鬼子兵拆掉了，到处都是日本人的警戒区，许多地方连路都不准走，究竟到哪里去住宿呢？真是“入穷志短”，没有办法，尽管自己曾经发过誓不再租住资本家王荣和的房子，眼前也只好托人向王荣和作保、说好话，央求他又让我们租住了过去住过的那间毗屋。

为了养活一家大小几口命，我和刚刚十四岁的大儿子便给日本人当苦力。整天给他们拉柴送菜，有时给水上司令部做工。父子两人一个推一个拉，累了一天下来，也只能挣到两三毛钱。一家人过的只是半饥不饱的生活。在这期间，我妻子生下两个孩子，都因为生活无着，养不活，先后死去了。

日本鬼子把我们中国老百姓是不当人看待的，做工时鬼子兵往往用刺刀押着，叫骂着，动不动就拳打脚踢。一天干下来，我们的骨头架子都好象累散了，有时甚至大便都蹲不下身子来。大儿子肩膀磨肿了，破皮淌血，还得咬着牙干下去……这受不尽的苦罪且不說，日本鬼子还故意侮辱我们，說我们中国人是“小小的”，他们日本人是“大大的”；每次进出城門，都要我们向他们的崗哨鞠躬。有一次，推菜进城，我瞅着两个日本兵正在說話，沒有给他们点头就打算推車进去，刚进城門口，鬼子兵便赶过来沒头沒脑地打

了我几耳光，嘴里还说：“你们中国人还不明白！”要罚我跪下去头上顶砖头……。这些事情虽然过去十八九年了，今天回想起来，心里还感到非常愤怒！

还记得有一次，我和大儿子给日本人推柴，刚推到东门外的运粮站，盟国飞机来轰炸，鬼子兵都跑进了防空洞，当我们也跟着跑去准备躲躲命时，洞口的鬼子兵却用刺刀对着我们，硬逼我们退到光马路上去。两枚炸弹在我旁边不太远的地方炸开了，我和大儿子当时都被震昏了，尘土把身子都盖住了，险些丢掉性命。回到家里，我妻子正在急得嚎啕大哭呢。又一次，大儿子在码头上给鬼子扛草包，上坡时大汗直流，把眼睛都迷糊了，不小心赤脚踩在一个碎玻璃瓶上，脚趾割破，鲜血往外淌，想歇一歇，一个鬼子兵却走过来，拉住我大儿子的胳膊，毒打了一顿，并硬逼他要继续扛包……。象这样的事情是说也说不尽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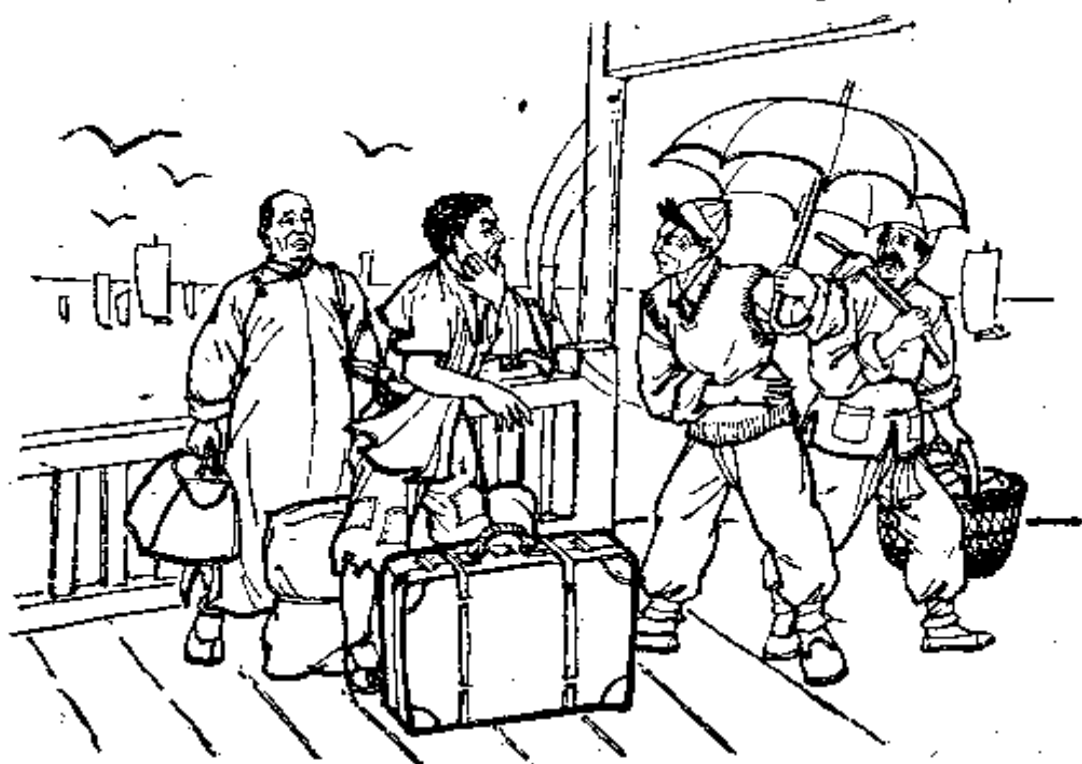
码头上的血泪

一九四五年日寇投降了，我满以为这一下该可以有条活路。可是哪知国民党一回来，穷苦人还是没有出头之日。

码头上封建把头又鑽出来了。他们有反动政府做靠山，横行霸道，作威作福。要上码头干活的人，每

人就得首先繳給把頭五塊大洋的“登記費”。因為吃盡了找不着活干的苦頭，為了掙上碗飯吃，家里寧肯借債、當東西、餓肚子，還是掙命湊起十塊錢送給了把頭，我和大兒子才在碼頭上登記了個名字。進了碼頭，我家和別的碼頭工人一樣，過的仍是“汗干錢了衣服破，老婆孩子養不活”的悲慘生活。

那時候，安慶碼頭上有名的封建把頭，就有綽號“四大金剛”“陳三虎”“二十二吼”“七十二弟兄”等一百多個。他們都是專門為非作歹的壞蛋。象號稱“四大金剛”的馬五丑、陳吉泉、何少樂和郭少淮，四人中就有三個干過土匪。所有這些封建把頭們，把安慶洋船和民船碼頭，好象五牛分屍一般劃分為十幾個地段。他們自定地界，私訂陋規，各霸一方。自己不干活，坐著照分賬。那時流傳有句話：“大把頭的嘴，小把頭的腿。”扛貨出力的是我們，結賬收錢的却是他們。明說是我們每天扛的錢按四六分賬，四成給把頭，六成歸自己。實際上錢和賬都在把頭手里，分賬前七折八扣，什麼“照料費”“草鞋費”“看樣費”“散籌費”“茶水費”等一大套，三下五除二，少說要扣去一半，剩下來分成的就很少了。加上把頭們往往幾天不分賬，那時又物價飛漲，幾天前可以買幾斗米的工錢，拖了幾天就只能買兩盒“無敵牌”牙粉了。



把头們除了殘酷剝削以外，还經常毒打工人。有一次，我給一位旅客扛行李，才扛到岸上，被把头陈龙义的儿子見了，他喊：“沈大巴，誰叫你搬的！”一边說一边跳起来打了我几耳光。論力气我一只手就可以打过他，論受气也恨不得揍他一頓，可是在那种岁月里，为了有个飯碗，只好忍气吞声，由他打了也不敢还手。貨白扛了不算，还得向他賠不是。因为把头們都有后台老板，彼此是結拜弟兄，打起架来一窩蜂上。我亲眼見過不少同伴，因为攬貨扛，被打得鼻青眼肿。一九四七年，一次把头們为了霸占地段，唆使东門和南門的碼頭工人械斗，东門的工人便被打死三个。打死的是工人，吃亏坐牢的还是工人，打出来

的碼頭却是他們的。

躲不完的“抽丁”

一九四七年，国民党反动政府为了打内战，大量抓壮丁。在这以前，我全家人虽然吃苦受罪，到晚来还能在一起，再苦心是安的；可是开始抓丁以后，保公所說我大儿子“当龄”，硬要他去应征，我講明大儿子在碼頭干活，保长却偏說：“你大儿子上的是民船碼頭，算不得碼頭工人。”眼看沒有办法，只得叫大儿子成天躲起来，不敢見人。夜晚一家人都睡不好觉，一听见敲门声都吓得发抖。我妻子成天急得眼泪直流，到处找人說情，也是白搭。后来听说单戶独子可以緩征，干脆把大儿子“过繼”給人家，全家拆开来过，給他娶了亲，另撑門戶。不料想，到了腊月二十四，保公所还在照样向我家要人。可怜大儿子在人家都欢欢乐乐过年时，却黑夜摸着跑了三十多里路，到乡下岳父家去躲难。后来乡下也躲不住，他只得撐着一条船白天黑夜呆在怀宁和桐城交界的一条大河里，藏在蘆葦深处。这个县来抓便把船撑往那边，那个县来抓时又撑回这边。

在那些日子里，大儿子躲在船上，白天他不敢燒飯吃，怕被別人看見，只有到夜里才敢燒飯吃。这样一

連躲了几个月，后来保长見抓不到人，便向我家說：

“不給人就得給壯丁費！”家里只得把一点点活命的口粮也拿出来，先后两次送給保长七斗五升米，才算把事情带拖带抗地糊过去了。

見 了 天 日

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三日，安庆解放了。我一家人才熬过了重重磨难，終于盼到了出头的一天。

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，过去跨在我們脖子上压迫我們的人被打倒了，不合理的剝削制度被剷除了。

現在，在碼头上干活是完全另一个样子。过去跳板只有尺把寬，扛货时一不小心，有摔死的危險。現在跳板比过去寬了几倍，甚至能拉板車，就这样，为了防止万一发生事故，还在跳板下面拉起安全网。因此再不会发生生命的危險了。

另外，还給我們搬运工人建立了各种劳保福利組織，如洗澡堂、医院、疗养所、俱乐部……等。我們搬运工人可以享受到各种各样的劳保福利。

今天，我們一家祖孙三代生活在一起，三个儿子都已結过婚，还有四个孙男孙女，全家共有十四口人。我和三个儿子都参加了工会。在党的教育和培养下，大儿子和二儿子都光荣地加入了共产党，小儿子也是

共青团員。第二个儿子在旧社会里是人家看不上眼的穷爽油条的，現在却当上了安庆市人民代表。我自己解放前活了四十八年，从来被人家看做半个錢也不值的，碰上有錢人都叫我“站远些”，說我身上有汗臭气，提到“沈賢友”三个字，过去誰也不知道，大家都只喊我“沈大巴”，今天不但有了自己的名字，連市里的一些負責同志見了面也称呼我“沈老爹”，領導上还要我在老弱队里担任了行政队长。我和三个儿子都几次被选为先进生产者。六月里，我們公司开工人代表大会，我和两个儿子同时当选为代表参加了會議。

談到我們家里今天的生活，如果和过去比，簡直一个是天堂，一个是地獄。今天我們住的是从前資本家住的一幢十来間的四合院大瓦屋。党和工会組織还在各个方面关怀我們工人。去年大儿子害胃病，送医院作胃切除手术，公家一次就化了一百多元的医疗费。

人們說：“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痛。”实际上除了小儿子出世晚是在腋下长大的，我和两个大儿子至今身上都留有旧社会的伤疤：大儿子出力太早，至今背还有点駝；二儿子因为从小在燒餅店里当学徒，終年在潮湿的案板上睡覺，現在一身的皮肤病沒有好；我

自己的两条腿上布满了核桃大的疙瘩。我家破产进城时仅有的三件东西：一条祖传的桑木扁担、一担破籬筐和一床破絮，虽然经过前后七次搬家，却一直还保留着没让丢掉，每当逢年过节一家人在一起时，我总要拿出来让孩子们看看，要他们记住过去受苦受难的历史。去年我发现现在武汉工作的小儿子花钱大手大脚，我便专门要大儿子写信给他，告诉他今天的幸福日子是怎样来的，教他不要好了疮疤忘了痛。

(錫朋記)

辛酸的历程

安庆化肥厂副厂长 李渭滨

我有三个小儿子。一个在初中读书，两个上了小学，他们都十分可爱。我一看到他们那个天真活泼的样子，就禁不住回想起我在他们这般年纪时的苦难遭遇。

逼死祖父

我的老家原在贵池西门外。我祖父时，因为在那里做不到工，租不到地种，祖父和父亲才把家搬到元四村给地主当长工。元四村这地方尽是好山好田，原想总能混碗饭吃。谁想，祖父章永贞给地主干了几年活，仍是吃不饱，穿不暖，荒年吃观音土吃得连屎都屙不下来。不幸，这年姑父病死，年青的姑妈（祖父的女儿），无依无靠只好回娘家。到了年关，有钱人家都在忙着办年货，我们一家人蹲在一间破草屋里，吃没吃的，烧没烧的，真是可怜。

一天，地主兼族长章月先把祖父叫了去，他装出

一副好人相，对祖父說：“帮工不是兴家立业的正道，还是租点田种吧！”祖父唉声叹气的說：“种田好是好，哪里租得起啊！”鬼計多端的章月先笑了笑說：“你那寡妇女儿养在家里有什么用？她生是別家的人，死是別家的鬼，把她卖掉，湊点押板金，想法租几亩田种，总比帮工好过些唄！”

祖母听說要卖姑媽，痛哭流泪，亲生骨肉心連心，怎舍得卖呀！祖父也难过地說：“沒法子，卖了跟上人家，或許还能逃条活命，留在家里要活活地饿死呀！”祖父忍痛割肉地卖掉姑媽，原来想用这笔錢作为押板金，租几亩田种。沒想到，章月先知道祖父卖掉姑媽，得到一笔錢，他翻臉不認人，帶了两个狗腿子找上門来，借口錢粮催得紧，把祖父欠他家不滿两年的三石稻子，利滾息，七算八算算成二十多石，逼着要祖父馬上归还，不还他就要以族长的身份，把祖父开除出族，送到伪县衙里去抵押他的錢粮。祖父被逼得走投无路，一气之下，上吊死了。

祖父死去以后，連一副棺材都沒有。祖母和父亲用家里唯一的几块木板，釘起来装着祖父的尸体，含着血泪，正准备送上坟山安葬，章月先帶着狗腿子又找上門来，以族长的身份說：“上吊！沒出息，有損章家的門风。”他不准祖父尸体埋在祖山上，只能埋

到远远的荒壠里，只准横葬，不准直埋；子孙后代也不准上坟祭扫。祖父出葬那天，章月先还派狗腿子来监视着。地主的心肠多恶毒啊！

这时，家里还有祖母、父亲和叔叔，日子还得过呀，父亲、二叔帮人打短工。小叔帮地主放牛，后来不幸摔死在山壠里。

悲 惨 的 童 年

到了我六七岁的时候，父亲才租种了地主章玉坤的十多亩田。种田的规矩是：一切工本费都是我家的，打下的粮食，却得和地主对半分，每年年终还要办桌地租酒答谢地主，另外还得给地主做杂事。当时父亲想：凭着自己的劳力，总能养活一家人吧。

可是，旧社会哪有穷人如愿的事！头一年，因为我家没有底垫，春天吃的口粮和种子要向地主借。秋后，地主把算盘珠子一拨，除了他的，我家仍是想吃几顿白米饭都不行。没有吃的，只好再向地主借，他不但不借，反而怒冲冲地说：“要借，先得把以前欠的全还清！”我们全家有五张嘴要吃要喝，父亲东求西借，凑点钱，买了担糠，将就着糊口。叔叔去徽州给地主打长工，可怜他从此一去，打了十七八年的长工，结果得了风湿性关节炎，被地主赶出来，回家没

錢医治，活活地拖死了。因为家里吃口多，实在沒有办法了，父亲只好将我过繼給堂叔叔。

可是，繼父、繼母家也同样苦得要命。一間空蕩蕩的小茅屋里，只有四块鋪板搭成的一張床。一頂破帳子，补得象馬蜂窩似的。床上，是一条又薄又破的旧棉被。另外还有一口破鍋和几只飯碗。这便是全部的“家产”了。

那时，繼父害着严重的肺病，身体很差。可是为了不讓我这个繼子餓死，他每天仍起早摸黑地卖工担柴来維持生活。每当我看到他拖着瘦弱的身子在劳苦受累时，我真为他担心。終于，有一年的冬天，繼父因为过度劳累病倒在床上了。他大口地吐着鮮血。繼母急得到处借錢給繼父治病；可是哪里借得到呢？繼父有气无力地說：“別抓葯了，我的病是治不好的……”說着說着，一口气沒有上来，就死去了。

繼父死后，沉重的負担全落在繼母一人身上，日子越来越艰难了。繼母眼看实在无力把我养大成人，万般无奈，一天，她眼泪汪汪地跟我父亲商量，想卖身养子，由父亲出面将她卖掉。父亲哪肯答应，后来因为想到今后的日子实在难过，才颤抖着手在繼母的卖身契上划了个“十”字。繼母临走时，把卖身的四十块光洋給了父亲，哭着說：“叔哥，渭濱仍交还你操



心管教了，希望你用这笔卖身钱让他读几年书，长大免受别人歧视……。”父亲抹着揩不干的眼泪，向继母点了点头。

第二年春天，即一九一九年，父亲依照继母的嘱咐，跟妈唠叨着说：“我家祖宗三代都是睁眼睛子，连个名字倒顺都不认得，不论怎样苦，也得让孩子去读点书。”隔了几天，父亲真的把我送进学校读书了。那时我有多么的高兴啊！可是好景不长，当我读到第三年时，因为遇上灾年，田里没有收成，地主又来逼

租逼債，家里一連十多天沒有糧食下鍋，盡吃野菜。人家孩子放學回家吃午飯，我因回家沒飯吃，只好在校門外轉一轉，又餓着肚子去學校上課了。一天，父親把我叫到跟前，含着淚說：“兒呀！日子實在不好過，不能讓你再讀書了。”

這樣，我就失了學。以後，整天光着腳上山挖野菜吃，砍柴賣，過着吃糠嚙菜的日子。

苦難的徒工生活

公元一九二二年，我已經十五歲了。為了找一條活路，父親帶我到蕪湖當學徒。臨走那天，媽媽把父親的那件補了又補的破棉襖給我披上，送我到村頭，含着眼淚說：“去吧，孩子！不是做娘的心狠，實在沒法子啊！”到了蕪湖，父親花些錢托個人情，把我送到用生五金廠當學徒。可是，資本家說我是外路人，要先繳二十塊光洋的保證金，不然就不收。天啊，幫資本家做工還要先繳保證金！父親狠了狠心，把繼母賣身剩下的二十塊光洋拿出來，交給資本家，然後就在那張保條上，顛顛抖抖地按上了手印。我記得保條上寫着一條：“死傷勿論。”

那時，用生五金廠是蕪湖比較大的廠之一。資本家凶狠地欺壓工人。每天，我們的工作時間長達十五

六个小时。二三十人睡在一間小隔房里，挤得連身都翻不过来，冬天虱子成把；夏天臭虫成堆，咬得人身上青一块紫一块，又痛又痒，仅有的几个鐘头也睡不好覺。学徒期間，每月的工資只有十几个銅板，仅够剃头的。吃的是剩湯剩飯，冬天是冷的，夏天是酸的。穿的衣服鞋袜，資本家根本不管。夏天赤着身子还好混，到冬天就难过了。冬天，我上身穿着家里带去的那件破棉袄，下身穿一条破单褲，冻得直打哆嗦，老师傅們看了不忍心，湊点錢，給我到街上买来两条面粉袋，自剪自縫，做成一条四不象的单褲加在身上。脚上穿的是捡来的破鞋，前后漏洞。大雪天，两只脚冻的疼得鑽心，只好用麻袋片把脚包起来。就这样，苦苦地熬过了两年。后来工厂失火燒掉了。資本家分文不給还把我攆回家。回家哪有路費呢？我找資本家退保証金，他一口拒絕，还大罵說：“我的厂都倒霉燒掉了，不向你算飯錢，已够人情，还向我退保証金！”幸亏几位师傅看不过，湊些錢給我做路費，才回到了家。

我到家一看，家里仍是苦得要命，爸爸和媽媽餓得皮包骨头。在家也活不下去。剛过了年，父亲又托人把我送进蕪湖益新面粉厂当徒工。在那里，也跟在用生五金厂一样，什么杂活儿都干，工資分文沒有。

为了想学点技术，也只得挣扎着干。白天，看师傅们在机器上操作，深夜，就在一盏小小的煤油灯下自个儿画图、写字，但资本家却说我这样做是“违犯厂规”。这样，熬过了一年多，受尽了折磨。后来，资本家硬加我一条“屡犯厂规”的罪名，把我解雇了。我苦苦地哀求说，出去会饿死。可是资本家却说：“死了活该！”

在死亡线上挣扎

离开益新面粉厂，我进了贵池殷家汇煤场当矿工。这个矿是官僚资本家王正办的，他仗着军阀段祺瑞的势力，僱用代理人蒋尊弟，勾结一批地痞流氓，手拿皮鞭，腰别驳壳枪，把工人当作牛马驱使。有一次，我在煤井里修理机器，手脚都磨得血糊糊的，当时稍微歇了歇，监工见了就骂：“妈的！你不要狗命啦，尽磨洋工！”又有一次，我和师兄蒋长庚在井里修理水泵，一下没小心，两人一起从井中腰摔到井底，蒋长庚当场粉身碎骨；我幸亏掉到水坑里，才没有被摔死。狠心肠的监工不但不同情，还骂我：“混账东西，不做好事，尽出事故！”

那时，资本家根本不把我们当人看待，他们常说：“三只脚的蛤蟆不好找，可两条腿的人有的是！”

煤井里沒有通风設備，风量不足，在井底干活，直逼得人冒汗、头晕，甚至小便不出来，那滋味真比挨刀子还难受，而且还常常引起瓦斯爆炸，烧死人。有一天，井里瓦斯爆炸，五个工友被烧得象剥了皮一样，身上烂乎乎的。这种情景，人人见了，眼泪往肚内淌。可是资本家和狗腿子們，还胡说什么这好死歹死都是“命里注定”的！

一九二六年，殷家汇煤場停办，我跟师傅白华棟到貴池餛头山煤矿做工。在这里受苦受难熬过了六年。矿里一連五六个月不发工資，工友們穷得連剃头錢都沒有，头发长的老长，头上虱子多得能用手摸下来。吃不飽，穿不暖，资本家还用皮鞭逼着我們每天下井干十几个鐘点的活。工友們实在被欺压得沒法子了，有一次就举行罢工，要求发工資。这天，从早上开始整个矿都停工了。工友們一齐找到资本家代理人張学文，同他面对面地进行說理斗争。張学文先还要威风，后来大家把他圍个风雨不透，齐声高呼：“我們要活命！”“不发工資坚决不干活！”張学文吓坏了，想跑又跑不掉，才不得不答应我們的要求：欠发的工資全部补发！

这次罢工虽然胜利了，但張学文說罢工是我师傅領的头，便借口矿里亏本，把我和师傅解僱了。而且

还立下一条规矩：矿工中，凡是姓白的和白华棟的徒弟，一律不用！

从馒头山煤矿被赶出来以后，我跟师傅进了安庆集賢关煤矿。办这个矿的资本家是潘学固，他的父亲潘祺当过伪安徽省政府财政厅厅长，他们父子欺压工人，无恶不作，办矿三年，搜刮了大批工人血汗，便把矿山卖给上海的一个名叫陈少庭的资本家。陈少庭雇用封建把头姚西亚。姚西亚这个坏蛋，看我跟师傅有一手好手艺，干活又卖力，怕资本家器重我们，小看了他，光找我们岔子。一天实在弄得我师傅气极了，顶撞他几句，他就挑拨一批工贼，打了我跟师傅一顿。我的胸部被打伤积血，师傅也被打得半死半活。

在那里呆不下去，我和师傅只好离开集賢关煤矿来到安庆，靠工人弟兄凑点钱医好了伤。师傅和师母决定去九江找工做，不料在船上，师傅突然得了重病，船老板说是什么传染病，硬要把他活活丢进长江里去，师母向船老板磕了好多头，说了多少好话，才没有把师傅丢进江水里，后来师傅因为没钱医病，就活活地拖死了。

我离开集賢关煤矿不久，便和一个穷人家的女儿结了婚。后来又有了孩子，我的负担更重了，我们一家人的生活也更困难了。在此期间，我先后在宿松荆

桥煤矿、宣城大汪村煤矿等好几个煤矿做工。在那些日子里，也是尝够了人世间的苦难。

一九三七年，日本鬼子的铁蹄踏进了皖南，我由于吃够了奔波流离的苦头，决心回家种田。可是在那兵荒马乱的年头，种田也不好种。父亲、妈妈活活地饿死了。我跟妻子开点荒山播种玉米，却又惹了地主章玉坤，他不准我们开荒，并且指着我的鼻子骂：

“天是我的天，地是我的地，哪有你乱开的地方！”硬逼着我和妻子把开的荒地让给了他。那时候是他们的天下，我们穷人有什么法子啊！

那年头，反动派又到处抓壮丁，我东躲西藏，夜晚躲在山沟里。后来听说祁门有个茶厂，为了躲壮丁，只得连夜翻山越岭逃到祁门，想到茶厂里混碗饭吃。不料想在那人吃人的旧社会里，进工厂做工还要找保证人，我因为举目无亲，找不到保人，连做工的权利也被剥夺了。

后来多亏一位师兄的介绍，我进了宁国港口反动派办的军械修理所做工。在那里，我和妻子儿女一家五口住在一间矮小的茅棚里。隔壁是个粪坑，粪坑与我家中间只隔着一些茅草篱笆，臭气熏人，每逢夏天，蛆虫常常爬进我家的锅灶边和床铺边。在这样恶劣的环境里，一年之内，三个小孩就病死了两个，我妻子

的心都哭碎了。

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，我回安庆进了电厂。我滿以为这下該有个出头之日了，可是在那万恶的社会里，我仍旧当牛当馬，受尽了国民党、資本家的欺压。

我从十五岁开始当学徒，直到解放那年，共有二十七个年头。在那漫长的岁月里，我东奔西走，前后在資本家开办的大小二十一个工厂、矿山里做工，沒有一天不受气挨餓，过着牛馬般的生活。直到一九四九年解放大軍南下解放了安庆，我們全家才从地獄里爬出来，开始过着人的生活。

撥开雲霧見青天

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三日，安庆解放了。当我站在安庆电厂的院牆头上，看到那些紀律严明、和藹可亲的解放軍战士們，雄糾糾、气昂昂地开进安庆这座古城时，我心里真象春天的百花一样，欢乐地开放着。

在党的教育和关怀下，我的階級覺悟有了提高，我逐漸認識到，过去我們穷人受苦，是那个万恶的社会制度造成的。一九五〇年，我参加了共产党，从此成为一个光荣的共产党员。

我在旧社会里当了二十几年工人，經驗是积累了

一些，可是因为文化差，技术上总是提不高。党组织为了培养我们工人，特地把我送进文化、技术学校学习，还买了一些机械工业学方面的书籍，叫我好好学习。我因文化浅，学习中碰到弄不懂的问题，党和工厂里的行政组织又派技术人员来指导我。由于党的亲切关怀和热情鼓舞，经过几年来的刻苦学习，我终于克服了重重困难，使我的技术水平得到了提高。现在我已能单独在简易机械制造、修理、安装等方面，解决一些技术问题。几年来，因为工作的需要，我从安庆电厂先后被调到糖厂、通用机械厂、钢厂和化肥厂担任领导工作。一九六〇年，党又提升我当工程师。人民群众还选我当市人民代表和省劳动模范。我为党和人民做的事情很少，党和人民却给了我这么大的荣誉。所有这些，在解放前，我真是做梦也不敢想的。

我今年已经五十八岁了。大儿子和大女儿都已经进厂当了工人。三个小儿子也都上学了。全家过着幸福的生活。

可是过去苦难的童年，总是常常回到我的记忆里，激励我，也激励我一家人，为建设社会主义努力工作着。